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25周年： 现状与展望*

○ 陈光金 吕 鹏 林泽炎 宋 娜

摘要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是目前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全国性抽样调查之一，也是国内外各界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微观数据之一。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首次对国内外使用这套数据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还讨论了使用者在数据开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疑惑，从而有助于后来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实践（期刊、主题、学者和机构）方面的已有积累，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未来研究。作为调查的课题组成员，我们还对数据未来的设计和使用进行了展望，就这套数据如何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和营商环境的评价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文献计量分析；微观计量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18ASH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11）资助

引言

企业层面的调查和微观数据的发展，已经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数据和评价工作的高度重视，正在成为企业微观数据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内机构致力于开展企业层面的调查；在高质量发展和营商环境评估的新动力下，各类以企业和企业主为对象的调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数据的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大大推动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内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实证研究。

面对企业微观数据发展的蓬勃势头，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心得和建议呢？作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CPES）当前执行团队的成员，分享多年研究成果是我们的使命。中国大型社会调查起

步较晚，很多仅持续数年即夭折。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却成为目前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全国性抽样调查之一，且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整整25年。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正式开始，一直不断创新、改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调查中的一个独特品牌，获得了多方认可。

25年来，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孵化了大量成果。这些成果都有什么样的热点和亮点？对未来的研究能否起到指引作用？自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在全国工商联研究室的鼎力支持下向学术界有选择地开放部分数据以来，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数据使用者的迫切需求。^①为了更好地让学术界和政策界利用这套数据，作为可能最了解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的群体之一，我们将首先梳理这项调查的历史渊源，通过挖掘调查的基因和初心，展示调查数据的独特优势。

本文的主体部分是文献的计量分析。文献计量分析强调采用数学与统计方法来考察文献的外部特征，从而描述、评价和预测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1]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界，文献的计量分析已经成为了解数据特征和学科/议题发展趋势的一个利器。^[2-7]这些分析覆盖的范围和深度受限于作者的研究渠道、精力和对调查发展历程的了解程度。本文首次对国内外使用这套数据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力图展示这套微观数据丰富的内容和巨大的拓展潜力，^②回答了使用者经常感到困惑的几个问题，比如追踪、地理信息、代表性等。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反映了之前调查中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我们以探讨的方式解释目前的做法，并就未来如何进一步优化调查提出一些展望，希望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能够和其他微观企业调查一起，将象牙塔内生产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和社会影响力，为中

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营商环境的评价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调查和数据的基本情况

1. 缘起和背景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目前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主持。每两年进行一次，从1993—2018年进行了13次。

本调查缘起与中国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改革开放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产物。1992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先后在北京、河北（涿州）召开了两次小型座谈会，1993年冬季又在杭州召开了50人左右的研讨会。全国工商联也于1992年8月邀请100多人在北京召开了为期5天的研讨会。这些会议除形成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外，在组建全国性学术团体方面也达成了共识，建议由中央统战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宣传部、国家工商局、全国工商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筹备小组，在李定、晓亮、陆学艺、胡德平、王超平等参与组织下，筹备多年的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于1993年5月25日由民政部批准，5月31日至6月2日在太原召开成立大会。研究会理事由理论工作者、政策研究者和私营企业投资者组成，共160多人。^[8]

1993年春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张厚义研究员牵头，戴建中教授、工商联研究室负责人参加，共同申报的“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课题被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批准立项。1993年第一次调查的正式名称为“私营企业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共同主持。在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闭幕后，课题组将省、市（计划单列市）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和部分地区的副会长作为抽样调查骨干进行培训，根据各地私营企业登记的实有户数按1%比例分发问卷。散会后，各省市即组织具体实施。秋冬季收回有效问卷1440份。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由戴建中执笔写成《全国首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及分析》研究报告，将其择要上报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领导，再对全文加工、润色后最终以“中国私有企业主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名义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9]加上后来《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刊登的张厚义^[10]的文章，一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由于反响热烈，课题组成员议定今后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抽样调查。1995年第二次调查更名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调查”，改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

联共同主持。1997年的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厚义研究员筹集经费，以“中国私营企业课题组”的名义进行。从2000年起，在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第二任会长保育钧主持下，全国抽样调查逐渐制度化、规范化。2000—2002年两次调查的单位变更为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

从2004年起，历年调查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四家单位主持，调查的正式名称固定为“全国私营企业调查”。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四家单位具体组织实施。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列入年度工作计划，提供调研经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的专家自创立起即参与此项调查的设计与写作工作；有关部门负责人审阅定稿，再具体组织实施。每次问卷内容除基本部分外，都有增删。该调查在实际执行层面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2018年适逢本调查25周年，调查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回顾和创新工作。除了本文所进行的文献计量分析外，还设计了调查的Logo，恢复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课题组调查主持单位之一，开始建设调查网站等。

2. 独特优势与品牌效应

了解上述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基因”和初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份调查数据在分析中国企业和私营企业主方面的两个独特优势。

第一，时间的力量。虽然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在发布时是以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 Sets）的形式出现，^③但25年的积累使这套混合截面数据（Pool Data）具有了强大的时间维度力量。李炜在一篇综述国内社会调查的文章中，将本调查视为1990—1999年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大型社会调查之一，做了详细介绍。^[7]正是因为启动早、从未间断，调查数据全面、系统、翔实，对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长过程做了记录，因此很多早期的数据在今天愈发凸显出弥足珍贵的价值。用本调查发起人之一张厚义的话来说，“这些数据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它却是唯一的”。^[8]

第二，企业家的个人层面（Individual Level）信息与企业层面（Firm Level）信息兼备。当前虽然全国性的企业调查越来越多，但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关心的不仅仅是企业，更关心的是人——企业家。这个特点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原国家

工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工作或研究对象密切相关。正如李伟所说的那样：“此项调查是目前国内关于私营企业全国性调查中对于私营企业主个人特征，尤其是社会和政治特征调查最为集中的一项。”^[7]当然，从分析单位的角度来说，个人与企业并不等同，但考虑到中国私营企业的产权和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企业主本人手中，在一些情境下，个人层面分析单位和企业层面分析单位大体上可以合并，比如用企业营业收入这样的指标来替代性地测量企业主本人的财富。不过由于近几年的调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治理层面信息，在具体分析时使用者们也应对两个层面的分析单位可能带来的影响有所知觉。

可以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既包含重要经济信息，同时又与其他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搜集数据（比如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有着重大差异，因此有独特的地位。在中央愈加重视数据建设的今天，这是一项战略性的资源。工商联、工商局系统、国内科研机构和智库基于这套数据写了大量研究报告。未来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巩固和组建核心政策报告写作团队，开发出更加及时的政策报告，同时在第三方政策评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本调查历年数据的描述性分析报告有一些固定的发布渠道，^④通过出版、活动等平台，有力地促进了与企业家的交往和沟通。最后，调查数据还支持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促进了学科发展，扩大了社会影响。

3. 调查的方法和样本

作为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一个优势是样本量大、覆盖面广。虽然总量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去甚远，但课题组克服了经费、人力等方面的困难，努力保证样本规模、回收率；在最近几年全国私营企业数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调查样本数的增长（如表1所示）。

抽样的总原则是在全国范围内按一定比例（0.03%—0.05%左右，每次的比例根据调查经费的不同有所差别）进行多阶段抽样。第一，确定需抽样的总数和各省、市、自治区抽样户数；第二，在各省、市、自治区内抽取计划单，列市或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各一个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的县各一个；^⑤第三，按城乡比例确定城、乡调查户数；第四，按城乡各自行业分布确定各行业调查户数；第五，按等距原则抽取具体被调查户。但由于调查的执行主要依靠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部分早年调查还有农村工作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机构参与），早年的调查或在抽样方案或在执行上存在一定缺

陷，但研究者可以根据调查的具体设计自行选择优化策略。每次调查的具体设计都体现在了《调查手册》或综合数据分析报告中，^[11]在此不再赘述。从2004年开始，随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加入，样本的代表性问题有了极大改善。从2016年调查开始，我们使用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信息中心提供的全私营企业名录作为抽样框，进行更加严格的目录抽样和执行督促，在代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优度。

表1 历年全国私营企业数、调查完成样本数与回收率

年份	全国私营企业数 (万户)	调查完成样本数 (户)	回收率
1993	23.79	1440	84.20%
1995	65.6	2564	84.40%
1997	96.1	1946	85.10%
2000	176.2	3073	85.40%
2002	243.5	3258	89.60%
2004	365.07	3012	82.10%
2006	498.08	3837	96.90%
2008	657.42	4098	90.90%
2010	845.52	4614	94.16%
2012	1085.72	5073	92.20%
2014	1546.37	6144	87.80%
2016	2309.2	8111	100%

资料来源：私营企业户数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data.stats.gov.cn）

二、期刊文献的计量分析

1. 总体文献计量分析

内地文献指在中国内地出版、以中文为主的文献。我们选择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文献资源。期刊数据库的检索目标时间范围为1993—2017年。初检结果去重后经人工阅读全文或摘要筛选，共获得国内相关文献939篇。我们只分析其中直接使用类的期刊文献，即以CPES数据为数据来源、经过分析计算得到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献。经过筛选获得国内直接使用类文献共146篇，最早发表时间为1994年，即首次私营企业调查后的第二年，共3篇文献。^[9,12,13]

海外文献指在国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以英文为主的文献。我们选择Web of Science（简称WOS[SCI & SSCI]）、ProQuest、EBSCOhost、Scopus四个数据平台检索资源。WOS、ProQuest、EBSCOhost、Scopus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本报告中国际文献的数据来源，共获得国际相关文献64条，全部为直接使用类文献。文献最早发表于2006年，比中文文献晚了12年，当年共有5篇文献发表，其中3篇文献第一作者来自中国内地，^[14-16]1篇文献第一作者（当时）在中国香港工作，^[17]还有1篇文献第一作者来自美国。^[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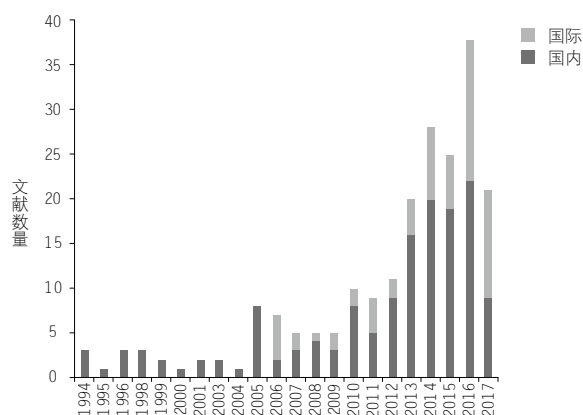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外直接使用类文献发表年份情况

内地和海外文献合计 210 篇，其发表时间如图 1 所示：2006 年之前只在国内有直接使用类文献发表，数量都在 10 篇以下；2006 年之后国内外均有文献发表，整体呈上升趋势，2016 年达到峰值。由于 2015 年之前数据发布渠道的问题，限制了成果的数量。我们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研究者使用这套数据，发表更多成果。当然，由于之前没有统计，更因为早期数据管理和传播渠道等原因，使用者对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称呼”也并不统一。虽然我们采取了多种策略进行检索，也难免有所遗漏，欢迎补充、指正。

我们将每篇文献使用的数据调查年份进行统计，可以看到 CPES 各年份数据的使用情况。2006、2008 和 2010 年的三次调查数据被使用频次最高，分别有 18、18 和 19 篇，占此次调查数据使用文献的 28%、35% 和 39%。图 2 将文献分成国内和国际两部分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国内文献使用到了 1993–2016 年的所有数据，其中使用较多的是 2006、2008、2010 年的调查数据，另外还有 3 篇文献未确定数据的调查年份。国际文献使用了 1993–2012 年的数据，其中使用最多的是 2006 年第七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一般情况下，调查结束后的 1–3 年内会出现最早一批基于该调查年份数据获得的研究成果。更新的数据显然更受到使用者的青睐，但对“历史议题”的挖掘则显得相对薄弱。事实上，早年调查中的很多题项从来没有被人深度开发过，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基于上述调查年份的标引，我们又统计了每篇文献中使用的数据年份情况。147 篇文章都只采用了 1 年的截面数据，占到所有直接使用类文献的 70%；有 16 篇使用 3 年数据，占 8%；有 2 篇使用的是 1993–2012 年 10 年的调查数据。^[19,20] 范晓光等于 2017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阶层

与同期群差异》使用了第 3–11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1997–2014 年）。^[21] 混合截面数据的使用偏少，可能与之前数据获取的渠道不畅有关。这也意味着使用多年截面数据进行长时段的分析，具有较大的空白值得填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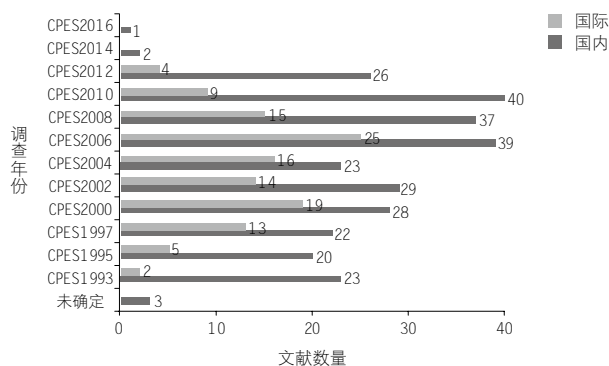


图2 CPES各年份数据使用情况

2. 内地文献计量分析

（1）主要机构

内地文献的作者来自 69 所机构，另外有 6 篇文献没有机构字段。我们将 69 所机构划分为高校、研究所与智库、企业和党政机关。高校构成机构用户的主体参与发表了论文 123 篇，占到全部文献的 84%。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所参与发表了 19 篇论文，占到 13%。企业和党政机关也有所参与，分别有 5 篇和 3 篇论文发表。

文献数量在 5 篇以上的机构排名情况如表 2 所示。中山大学有 28 篇论文发表，占全部文献的 19%，排名第一；其次是电子科技大学 14 篇；文献量在 10 篇以上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发表了 13 篇、12 篇和 10 篇论文。

表2 内地文献数量在5篇以上的机构排名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文献数量
1	中山大学	28
2	电子科技大学	14
3	中国人民大学	13
4	浙江大学	12
5	中国社会科学院	10
6	华中科技大学	9
7	复旦大学	9
8	华南师范大学	8
9	北京大学	6
1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6
11	上海财经大学	5
12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5
13	清华大学	5

如图 3 所示，在论文数量排名前 13 的机构中，中山大学与其中 7 家机构有合作，清华大学与其中 6 家机构

有合作, 华中科技大学与其中 5 家机构有合作。北京社会科学院是唯一一所没有与其他 12 家机构有合作的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发表的 6 篇论文则都是合作产生的, 没有独立发表的文献。机构间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一般是一两篇, 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电子科技大学与浙江大学合作发表的论文, 各 3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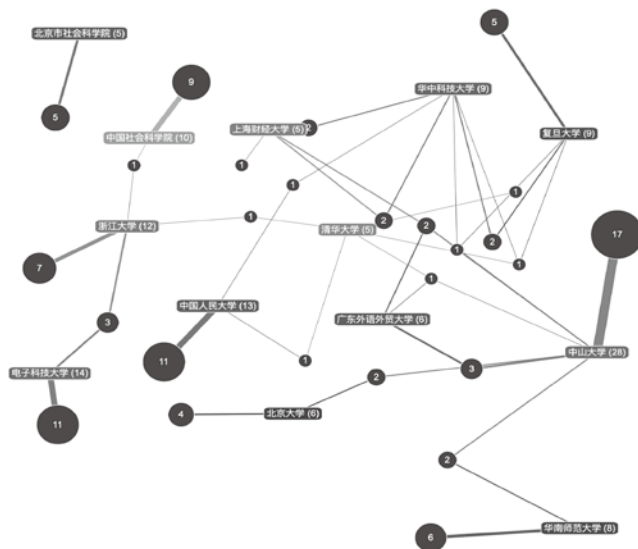


图3 内地文献量排名前13的机构间合作关系

(2) 高产学者

表3 发表内地文献数量3篇及以上的学者排名情况

序号	学者	所属机构	文献数量
1	李新春	中山大学	11
2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	8
3	井润田	电子科技大学	7
4	宋丽红	中山大学	7
5	朱斌	中国人民大学	7
6	李孔岳	中山大学	7
7	何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6
8	陈爽英	电子科技大学	6
9	魏下海	华南师范大学	6
10	何晓斌	华中科技大学	5
11	董志强	华南师范大学	5
12	陈凌	浙江大学	5
13	戴建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4
14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		4
15	刘平青	北京理工大学	3
16	冯天丽	电子科技大学	3
17	张慧玉	浙江大学	3
18	朱沆	中山大学	3
19	眭文娟	电子科技大学	3
20	陈东	南京大学	3
21	陈光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	3
22	马骏	中山大学	3
23	高勇强	华中科技大学	3

全部文献一共涉及 190 位作者。论文数量最多的是来自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李新春, 发表了 11 篇论文。经

统计, 最早 1 篇发表于 2010 年, 2013–2016 年连续发表了其他 10 篇文献。2016 年论文数量最多, 有 4 篇; 以第二作者发表的论文《地区宗教传统与民营企业初始资金来源》所在刊物复合影响因子高达 10.597。^[22]

表4 近五年发表内地文献数量较多的学者

序号	学者	所属机构	近五年文献数量	论文总数量	近五年占比
1	李新春	中山大学	10	11	91%
2	朱斌	中国人民大学	7	7	100%
3	魏下海	华南师范大学	6	6	100%
4	董志强	华南师范大学	5	5	100%
5	陈凌	浙江大学	5	5	100%
6	何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	6	83%
7	何晓斌	华中科技大学	4	5	80%
8	李孔岳	中山大学	4	7	57%
9	宋丽红	中山大学	4	7	57%
10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	4	8	50%
11	眭文娟	电子科技大学	3	3	100%
12	张慧玉	浙江大学	3	3	100%
13	马骏	中山大学	3	3	100%
14	陈东	南京大学	3	3	100%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路路是 CPES 早期调查课题负责人和主要参与人之一。李路路长期从事社会分层研究, 其发表的论文数量也相对较多, 共 8 篇。相对李新春, 李路路发表的文献起步较早, 1995 年就开始应用 CPE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23] 其中复合影响因子最高的 (10.597) 是 2011 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论文 (第三作者) ——《民营企业社会身份、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捐赠》。^[24]

2013–2017 年发表论文在 3 篇以上的学者有 14 位, 按其近五年发表论文数量排列, 并根据他们的论文总数得出近五年的论文量占比, 如表 4 所示。其中, 有 9 位学者发表的论文 90% 以上都集中在近五年, 分别是中山大学的李新春、中国人民大学的朱斌、华南师范大学的魏下海和董志强、浙江大学的陈凌、电子科技大学的眭文娟、浙江大学的张慧玉、中山大学的马骏和南京大学的陈东。发表论文最多的仍然是中山大学的李新春, 近五年有 10 篇文献, 但都不是第一作者; 居第二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斌, 近五年有 7 篇文献, 其中只有 1 篇文献不是第一作者。

(3) 来源期刊

内地文献共来自 82 种期刊。其中《管理世界》刊载了 14 篇文献, 第一篇论文发表于 2009 年,^[25] 除 2011 年和 2017 年以外每年都有相关文献发表。《社会学研究》刊载了 10 篇论文, 发表时间集中在 1995–2001 年和 2013–2017 年。这两种期刊刊载的文献相对于其他期刊来说数量较多, 分别占到总文献的 10% 和 7%。《经

济研究》排名第三，刊载过 5 篇文章。^[22,24,26-28]

表5 刊载文献3篇及以上的期刊排名及复合影响因子情况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献数量	复合影响因子
1	管理世界	14	4.751
2	社会学研究	10	4.560
3	经济研究	5	10.597
4	南开管理评论	4	6.960
5	科研管理	4	3.143
6	世界经济	3	5.795
7	中国工业经济	3	8.170
8	中国社会科学	3	7.137
9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0.901
10	商业经济与管理	3	2.329
11	学术研究	3	0.752
12	科学学研究	3	3.326
13	管理学报	3	2.408
14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3	2.333

(4) 被引用情况

146 篇文献篇平均被引频次为 24，中位数为 5。其中，有 26 篇论文截至 2018 年 2 月未被其他文献引用，有 69 篇论文被引用了 1-10 次，这两部分占到全部文献的 65%；被引频次在 11-30 次的论文有 21 篇，31-50 次的论文 12 篇，51-100 次的论文 8 篇，被引超过 100 次的论文有 10 篇。被引频次最高为 411 次，是李路路于 1995 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23] 表 6 是在 CNKI 数据库中被引用超过 100 次的论文列表。

表6 在CNKI数据库中被引用超过100次的论文

序号	题名	作者	期刊名称	发表年份	CPES调查时间	被引频次
1	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	李路路	社会学研究	1995	1993	411
2	民营企业社会关系资本对研发投入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陈爽英，井润田，龙小宁，邵云飞	管理世界	2010	2006	247
3	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	梁建，陈爽英，盖庆恩	管理世界	2010	2006	188
4	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背景、多元化战略与企业业绩	张建君，李宏伟	南开管理评论	2007	2002	151
5	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	戴建中	社会学研究	2001	1993;1995;1997;2000	148
6	制度环境与私营企业家政治联系意愿的实证研究	冯天丽，井润田	管理世界	2009	2006	148
7	外商直接投资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证据	袁诚，陆挺	经济研究	2005	1997;2000;2002	146
8	中国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经验研究	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	经济学(季刊)	2005	2000	146
9	“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	高勇强，陈亚静，张云均	管理世界	2012	2008	127
10	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与企业绩效	张其仔	经济管理	2004	2000	102

(5) 研究热点

我们通过人工编码的方式对文献研究主题进行划

分，将 146 篇文献标记了 22 种主题方向。在参政议政、营商环境、社会阶层、治理结构、慈善捐赠这些方面的研究文献比较多，均超过 20 篇；在研发创新、劳资关系、经济绩效、融资金融、创业成长、管理战略方面的研究文献也在 10 篇及以上。如果从时间趋势上来说，文献研究较早、数量较多的主题是社会阶层；出现较晚的主题是慈善捐赠和研发创新，慈善捐赠相较而言是近几年的热门主题。

表7 直接使用类文献主题方向统计表

序号	主题方向	文献数量	序号	主题方向	文献数量
1	参政议政	30	12	社会资本	8
2	营商环境	29	13	企业家精神	6
3	社会阶层	28	14	家族传承	6
4	治理结构	22	15	出口外贸	4
5	慈善捐赠	21	16	宗教信仰	4
6	研发创新	18	17	态度认同	4
7	劳资关系	16	18	投资	4
8	经济绩效	16	19	行业准入	4
9	融资金融	13	20	冲突纠纷	3
10	创业成长	11	21	性别	3
11	管理战略	10	22	税费成本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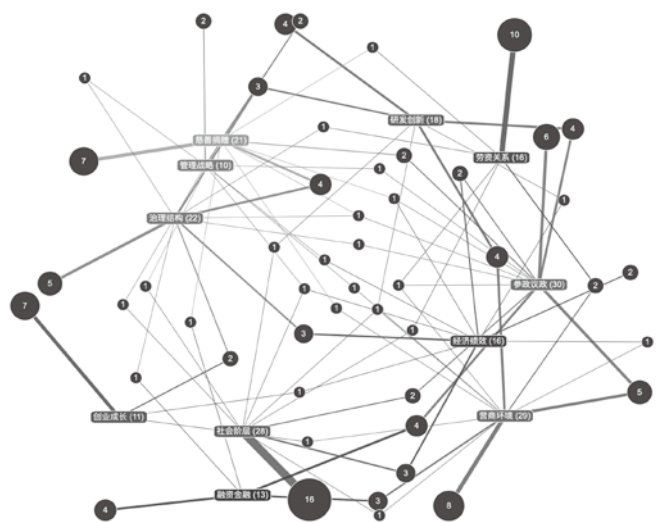


图4 直接使用类文献主题方向聚类

一篇文献往往不止一个主题方向，每篇文献涉及的主题数量也不相同，我们按照主题词进行聚类，将具有同一主题的文献统计出来，与这些文献涉及的其他主题相互关联，得到图 4。图 4 只选取了文献量较多的 11 个主题词，上面的数字代表论文数。从图中可以看出，只涉及一个主题方向的文献并不多，除劳资关系、创业成长、社会阶层以外，其他 8 个主题词均有 2/3 以上的文献与其他主题词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如研究参政议政的论文有 30 篇，只有 6 篇论文没有涉及其他 10 个主

旦大学与3所机构有合作；华中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与2所机构有合作。只有南加州大学发表的5篇文献没有同其他11所机构合作，而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的论文都是合作发表的。

（3）高产学者

表10列举了发表2篇及以上SSCI期刊论文的作者。其中，发表文献最多的作者是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贾楠（Nan Jia），发表了5篇文献。^[29-33]但是总的来说，海外文献作者中来自美国的只有3位，而来自中国的作者多达13位。华中科技大学的高勇强是发表SSCI期刊论文最多的国内学者之一，对国内期刊文献主要作者进行分析发现，他还发表了3篇基于CPES的国内期刊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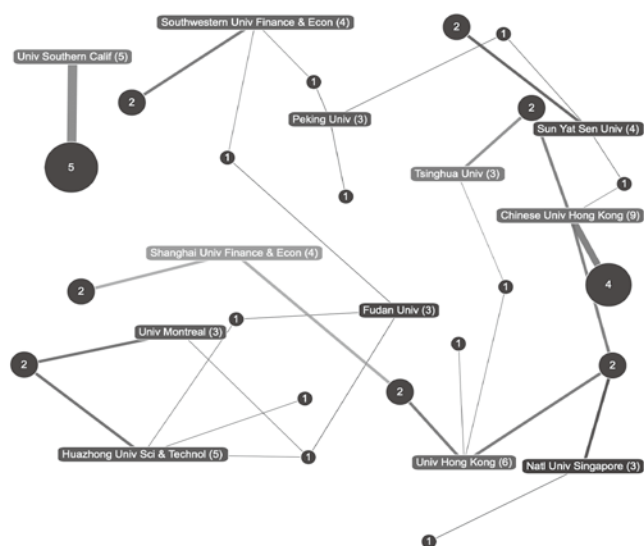


图6 发表SSCI期刊文献3篇及以上的机构间合作情况

表10 发表2篇及以上SSCI期刊论文的学者

序号	作者	机构	国家或地区	文献数量
1	Jia, Nan	南加州大学	美国	5
2	Gao, Yongqiang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	4
3	Tao, Zhigang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4
4	Wu, Yiping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	4
5	Lu, Yi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3
6	Hafsi, Taieb	蒙特利尔大学	加拿大	3
7	Lu, Jiangyong	北京大学	中国	2
8	Zhou, Wubiao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2
9	Dong, Zhiqiang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	2
10	Du, Julian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2
11	He, Xiaobin	复旦大学	中国	2
12	Li, Hongbin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2
13	Long, Cheryl	厦门大学	中国	2
14	Meng, Lingsheng	马里兰大学	美国	2
15	Su, Jun	北京工商大学	中国	2
16	Wei, Xiahai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	2
17	Zhang, Chao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2
18	Zhao, Hongxin	圣路易斯大学	美国	2
19	Zhu, Jiangnan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2

（4）来源期刊

据统计，基于CPES研究的47篇SSCI期刊论文共发表在31种期刊上。我们统计了该31种期刊在2016年的JCR影响因子情况与论文数量的关系，如图10所示。期刊影响因子分布在0.3-6，大部分期刊影响因子小于3，只有3种期刊影响因子大于3，分别是：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影响因子5.774；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影响因子4.929；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影响因子4.461。发表文献3篇及以上的期刊共3种，分别是：China Economic Review，刊发论文5篇，影响因子为1.366；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刊发论文4篇，影响因子为1.103；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刊发论文3篇，影响因子为0.394。以上6种期刊详见列表11。海外期刊的层次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表11 影响因子大于3或刊发期刊数量3篇及以上的海外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JCR影响因子	文献数量
1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5.774	2
2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929	1
3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4.461	2
4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66	5
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03	4
6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0.394	3

（5）被引用情况

表12 WOS平台被引用次数超过30的论文

序	被引	题目	发表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	CPES
号	次数		年份		当时所属	年份
					机构	
1	302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2008	Li, Hongbin	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	2002
2	113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2006	Li, Hongbin	香港中文大学	2002
3	60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Access to Bank Loans - Evidence from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2006	Bai, Chongren	清华大学、香港大学	2000
4	48	Tocquevillian Moments: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by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2006	Ma, Dali	芝加哥大学	1995
5	41	Does Giving Lead to Gett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2010	Su, Jun	北京工商大学	2006
6	36	Are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s and Private Political Action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Private Sector	2014	Jia, Nan	南加州大学	1995; 1997; 2000; 2002; 2004; 2006
7	33	Bank Financing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 The Payoffs of Political Capital	2009	Zhou, Wubiao	南洋理工大学	2000
8	33	Venturing Abroad by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test of Dual Strategic Intent	2011	Luo, Yadong	迈阿密大学	2004

SSCI期刊文献被引频次指的是文献在WOS平台上的被引次数。在47篇SSCI期刊论文中，有10篇论文暂未被其他论文引用，约占21%。被引用1-10次的文献有21篇，约占45%，其中20篇被引用1-6次，只有

1 篇文献被引用 10 次。被引用 11–50 次的文献有 13 篇，约占 28%。被引次数超过 50 次的只有 3 篇，分别被引用 302 次、113 次和 60 次。当然，被引频次还受到文献发表时间的影响。被引频次越高，发表时间越早。被引最高的 2 篇文章都是李宏彬以第一作者发表的。^[34,35] 没有被引用的 10 篇文献都发表在 2016–2017 年。表 12 列示了被引频次超过 30 次的论文。

(6) 研究热点

国际文献在营商环境、参政议政、慈善捐赠、融资金融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多的，文献量均超过 10 篇。关于劳资关系、社会分层、冲突纠纷、经济绩效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每个主题方向均有 5 篇文献。

表13 国际文献主题方向统计表

序号	主题方向	文献数量	序号	主题方向	文献数量
1	营商环境	16	11	研发创新	3
2	参政议政	13	12	社会资本	3
3	慈善捐赠	13	13	企业家精神	2
4	融资金融	12	14	投资	2
5	劳资关系	5	15	管理战略	2
6	社会分层	5	16	创业成长	1
7	纠纷冲突	5	17	家族传承	1
8	经济绩效	5	18	性别	1
9	出口外贸	3	19	行业准入	1
10	治理结构	3	-	-	-

接下来我们将主题方向逐年统计。营商环境方向的文献主要集中在 2014 年以后；慈善捐赠方向的文献主要集中在 2015 年以后；而参政议政和融资金融方向的文献分布则相对比较平均；劳资关系方向的文献直到 2016 年才开始出现。从整体上看，文献较少的主题方向文献发表时间也相对较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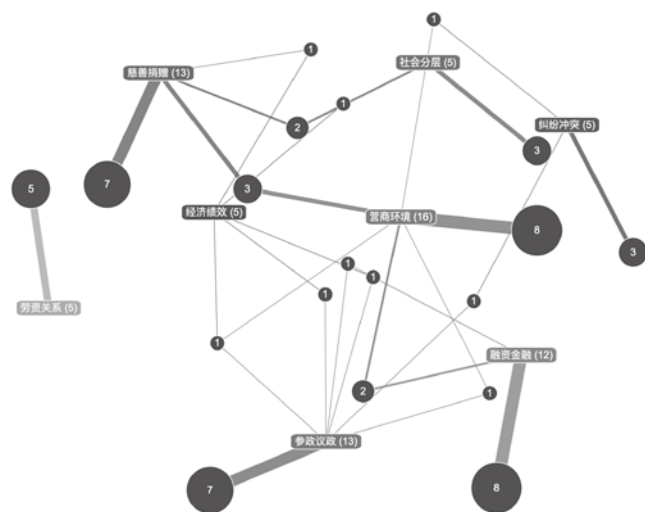


图7 国际期刊文献主题方向聚类

国际期刊文献每篇都有 1–3 个主题方向，为了研究这些主题方向之间的关系，我们选取了文献数量在 5 篇及以上的 8 个主题方向进行聚类，如图 7 所示，营商环境、参政议政、慈善捐赠、融资金融这 4 个文献数量较多，主题方向都有半数及以上的文献只涉及单一主题，剩下不到半数的文献还涉及了其他主题，如营商环境方向的文献有 16 篇，其中有 8 篇未涉及图中其他主题，另外 8 篇文献还研究了慈善捐赠、经济绩效、参政议政、融资金融、纠纷冲突这 5 个主题中的其中几个。研究劳资关系的 5 篇文献没有涉及图中显示的其他主题方向。

三、发展与展望

虽然计量历史分析这个领域在最近几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通过之前的文献计量分析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使用者们还是更偏爱使用近期的单年截面数据，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对早年问卷的挖掘严重不足，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对多年混合截面数据的使用也是如此，长时段分析的比例目前依然偏低。一些数据申请者过于关注是否可以获取追踪数据，却忘记了目前开放的混合截面数据本身就可以回答许多值得关注的与时间效应有关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有必要再次呼吁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界同仁加大对历史数据的关注，同时鼓励使用多套问卷构建混合截面数据。

我们整理 1993–2016 年历年题项集合并在官网上公开，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查询每一个变量的年度分布状况。简言之，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保持了基础模块与热点模块相辅相成的格局。不过这项调查历时 25 年，很多早年数据并没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主题，更像是一份“综合状况调查”；近些年的调查都是“核心题项+热点问题”的模块，但热点模块有时不限于一个，比如 2008 年是《劳动合同法》，2010 年是行业协会商会，2012 年是社会态度，2014 年是发展环境、网络行为，2016 年是家族传承、产业转型、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基础模块的题项多年来尽可能地保持了稳定。比如在个体层面，企业主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主观阶层地位认同、政治面貌、家庭人口数等 25 年以来都保持了稳定；在企业层面，企业注册类型、行业、营业收入、利润、税收、非税负担等关键题项也几乎从未间断。一些题项虽然在设计上略有变化（比如职业流动经历），但也在变动时考虑了兼容的可能。还有一些题目，比如雇工规模、劳资关系、企业治理结构、慈善捐赠、借贷、

科技创新等,虽然在早年没有固定调查,但随着这些议题重要性的上升,在近十年的调查中也得到固定并将长期固定下去。如环境治理、企业家信心这些近年重要性更加突显的议题,也将在未来被反复追问。通过这样追踪性的问题,加上追踪调查的完善,我们将有望在未来更好地检验和评估中国私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进展和趋势。

热点模块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也与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的工作重点密切相关。25年以来,这些模块的题目变动较大,有很多都针对非常具体的政策问题,如“2002年的七一讲话”“非公经济38条”等。热度过后,这些针对具体政策的题项并不是废题,而是为研究者做政策效应评估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更多热点模块关注的则是若干年内的重大政治或政策议题,如非公党建、家族传承、年轻一代企业家培养、融资难、用工荒、互联网+、媒体信任等。在2018年的问卷设计中,我们尤其突出了营商环境评估这个模块,就是希望通过对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的调查,为评价营商环境找到短板做出贡献。我们亦希望,通过向学术界开放数据的使用,获得学者们对真实世界的真问题的关注,除了踊跃发表学术论文之外,也能够参与到对政策和公共议题的发声当中。我们将以数会友,持续发现和鼓励这样的学者及其团队,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营商环境的优化。

参考文献

- [1] 邱均平,王曰芬.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 [2] 唐丽娜.社会调查数据管理:基于Stata 14管理CGSS数据.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 [3] 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2012,(5): 142-158.
- [4] 石本仁,张俭.中国家族企业研究综述——基于1998-2012年CSSCI来源文献的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9): 18-29.
- [5] 魏志华,林亚清,吴育辉,李常青.家族企业研究:一个文献计量分析.经济学(季刊),2014,13(1): 27-56.
- [6] 杨玥.国内外家族企业研究热点的文献计量分析.中国市场,2011,(52): 38-39.
- [7] 李炜.与时俱进: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调查研究的发展.社会学研究,2016,(6): 73-94.
- [8] 张厚义.中国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9] 中国私有企业主阶层研究课题组.我国私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与私有企业主的群体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94,(4): 60-76.
- [10] Zhang, H.. The Position of the Private Entrepreneur Stratum i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5, (4): 29-36.
- [11] 中华全国工商联. 1993-2006: 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 中华工商联出版社, 2007.
- [12] 石秀印. 青年老板初露峥嵘. 中国青年, 1994, (5): 23-24.
- [13] 张厚义. 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 1994, (6): 100-116.
- [14] Chen, G., Li, J., Matlay, H.. Who Are the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A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Attributes and Business Governance.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06, 13(2): 148-160.
- [15] Li, J., Zhang, Q., Fung, H. G.. China's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06, 13(2): 198-207.
- [16] Bai, C. E., Lu, J., Tao, Z..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Access to Bank Loan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6, 14(4): 611-628.
- [17] Li, H., Meng, L., Zhang, J..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Inquiry, 2006, 44(3): 559-578.
- [18] Ma, D., Parish, W.. Tocquevillian Moments: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by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Social Forces, 2006, 85(2): 943-964.
- [19] 周旅军. 符号分层: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嵌入模式及其地位认同差异——基于1993-2012年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社会发展研究, 2016, (3): 27-43.
- [20] Marquis, C., Qiao, K.. Communist Ideological Imprint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 Study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2017, (1): 10-5465.
- [21] 范晓光, 吕鹏.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 阶层与同期群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4): 70-87.
- [22] 辛宇, 李新春, 徐莉萍. 地区宗教传统与民营企业创始资金来源. 经济研究, 2016, (4): 161-173.
- [23] 李路路. 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 社会学研究, 1995, (6): 46-58.
- [24] 高勇强, 何晓斌, 李路路. 民营企业社会身份、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捐赠. 经济研究, 2011, (12): 111-123.
- [25] 冯天丽, 井润田. 制度环境与私营企业家政治联系意愿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2009, (8): 81-91.
- [26] 袁诚, 陆挺. 外商直接投资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 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05, (3): 69-79.
- [27] 魏下海, 董志强, 黄玖立. 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 2013, (8): 16-28.
- [28] 肖作平, 张欣哲. 制度和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 经济研究, 2012, (s1): 91-104.
- [29] Jia, N.. Political Strategy and Market Capabiliti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Private Sector.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Review, 2016, 12(1): 75-102.
- [30] Ang, Y. Y., Jia, N.. Perverse Complementarit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Use of Courts among Private Firm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4, 76(2): 318-332.
- [31] Jia, N.. Are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s and Private Political Action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Private Secto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2): 292-315.
- [32] Jia, N., Mayer, K. J.. Political Hazards and Firms'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2): 203-231.

- [33] Haveman, H. A., Jia, N., Shi, J., Wang, Y..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Embeddedness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7, 62(1): 67-104.
- [34] Li, H., Meng, L., Wang, Q., Zhou, L. A..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87(2): 283-299.
- [35] Li, H., Meng, L., Zhang, J..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Inquiry*, 2006, 44(3): 559-578.

注释

- ① 使用者可通过本调查的官网 (<https://cpes.zkey.cc/>) 申请数据了解最新的数据开放政策。感谢国家图书馆科学评价中心全体职工对调查及文献整理的支持。
- ② 有匿审专家要求我们交代使用该数据库对于推动我国私营企业发展,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这将是好几篇文献综述才能完成的工作, 且几乎将翻倍扩充我们的文章篇幅。而我们这篇文章并不是一篇文献综述。事实上,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和能力完成这样的综述。因为这 200 多篇论文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几大一级学科, 涵盖诸多权威学术期刊, 跨越了 25 年的时间, 每篇文章都有独特的知识贡献。我们功力浅薄, 尚没有那么深厚的学术素养来对如此广阔的知识领域、如此时间持久的文献跨度做出评价, 去评判很多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的研究议题做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贡献。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通过若干篇分主题的文献综述, 来完成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 ③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在设计之初是一项截面调查。在早年, 调查的设计者特别强调匿名, 目的是可以让受调查者放心; 但由此造成的一个缺点是, 每次调查结束之后都不知道有多少企业与之重合。因此, 从 1997 年开始, 调查团队在征得一批企业同意的前提下, 选择了 1000 家企业开始做追访。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企业只剩下不足 200 家可以追踪得到。我们对这些追踪企业进行了重新整理, 并开始设计新一轮的追踪方案。出于对企业和使用者负责的态度, 应有关部门要求, 追踪数据的部分尚且不能公开使用。
- ④ 2012 年及之前的版本主要发表在 1994-2013 年的《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上。上述报告的 1993-2006 年各版本, 最终单独被抽取出来结集出版为《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 (1993-2006)》。2014、2016 年两次调查的综合报告刊登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第 12、13 卷上。此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张厚义、陈光金等组织编写的《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6 卷也刊登了大量相关的分析报告。
- ⑤ 在实际执行层面, 工商总局的执行团队选取的城市为固定的联络点城市, 因此我们不鼓励研究者基于本数据做分省乃至分地级市的分析。为了避免一些带有评估性质的研究给联络点城市造成工作上的干扰, 我们也隐去了被调查企业所在地的地理信息。这也是国内一些大型社会调查 (比如 CGSS) 的做法。

作者简介 陈光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 吕鹏 (通讯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 林泽炎,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研究室研究员、博士, 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宋娜, 国家图书馆馆员、硕士,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用户与信息服务研究

The 25 Years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Points and Prospects

Chen Guangjin¹, Lü Peng¹, Lin Zeyan², Song Na³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ASS; 2. Research Offic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3. Science Evaluation Center,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CPES) is one of the most enduring large-scale nationwide sample surveys in China, providing important micro data for understanding and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eur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PES is now handled by the Private Enterprise Research Project Team, composed of members from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ese Private Economy Research Association. It is conducted once every two years, and 12 surveys have been done until now (in 1993, 1995, 1997,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and 2016, respectively). The article firstly review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is survey to provide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purposes and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data. Based on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vide an overall picture of academic articles in China and abroad that use the CPES data. The mainland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totaled 210 from 1993 to 2017. The article shows the structure of the data-set,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literature, the most published and cited papers, the high impact institutions, and composition of the author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problems that users may encounter during data mining. By doing so, it aims to help other researcher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s been done (e.g. journals, topics,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and do their own research in a more targeted way. As members of the survey project team, we also take a prospect of the future data design and use, and offer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use the CPES data to impro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Bibliometric Analysis; Micro Data